

系统分析与主观体验之间：诗歌阐释中的结构主义审视

秦檬檬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金华

收稿日期：2026年8月3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4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3日

摘要

文章通过将结构主义理论应用于英语抒情诗阐释，考察结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中的价值与局限。文章从“关系构成意义生成基础”这一核心命题出发，检验索绪尔语言学框架、二元对立和互文性等理论工具在诗歌阐释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结构主义能够揭示意义如何生成于文本内外的系统性关系网络，并为文学阐释中的主题建构提供方法论指导；但其对系统分析的过度依赖，也容易忽视作者意图与读者体验。文章认为，文学批评应在方法论分析与审美体验之间保持平衡，从而拓展文学阐释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

结构主义，系统，语言学，二元对立，互文性

Between Systemic Analysis and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 Examination of Structuralism in Poetic Interpretation

Mengmeng Q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Received: August 3, 2026; accepted: October 4,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3, 2026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values and limitations of structuralism in literary criticism by applying structuralist theory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English lyric poetry. Starting from the central proposition that relations underpin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it evaluates the usefulness of Saussurean

linguistics, binary opposition, and intertextuality as tools of poetic interpretat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structuralism reveals how meaning emerges from systematic networks within and beyond the text and offers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thematic construction. Its strong dependence on systematic analysis, however, can obscure authorial intention and readers' experience. The article therefore argues that literary criticism should balance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with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order to exp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Keywords

Structuralism, System, Linguistics, Binary Opposition, Intertextual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几何学中，孤立的一个点无法获得确定的意义；一旦被置入某个系统，它的意义便会显现。例如，在三角形系统中，同一个点既可能是顶点，也可能是重心，具体取决于它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这一数学原理体现了结构主义的基本逻辑：意义并不内在于孤立实体，而是产生于系统内部的相对关系。普罗普曾指出：“一个要素的功能由它与序列中其他部分的关系所决定” ([1]: p. 245)。在文学中，文学符号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它们处于语境、文化和历史背景等多重关系网络之中；诗歌意象开放而不限的指涉，以及特定符号在不同文化中的语义迁移，均可说明这一点。

数学通过赋予几何对象以精确数值来化简复杂问题；与此相似，语言学依据语言规律梳理纷繁的语言现象。文学以语言为基本材料，这使语言学模式能够被移用于文学阐释。事实上，索绪尔的语言学框架确实为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

索绪尔语言学中的能指与所指、言语与语言等概念，都呈现出二元对立的特征。列维-斯特劳斯在文化人类学中的成果进一步验证了二元对立模式的有效性；雅各布森将隐喻与转喻应用于诗歌批评的实践，也表明二元对立能够成为文学分析的有力工具。二元对立常被视为文学作品主题建构的基础，而文本之间形成的对立关系又使人联想到互文性。互文性是结构主义的重要概念，其基础在于似真性 (*vraisemblance*)：只有把文学作品置于恰当的关系网络之中，作品才可能获得可理解的意义。

结构主义鼓励人们从系统角度审视文学作品。然而，文学批评毕竟是一种审美活动，因此不可能完全排除主体性。作者对作品的影响不应被忽略，读者自由阐释的权利也不应被剥夺。

结构主义虽然已不再是当代文学理论的中心，但其关系性思维与文本分析方法仍持续受到重估。国内研究一方面通过西方文论史与符号学框架重新梳理结构主义的理论位置[2]-[4]，另一方面也从方法论和文论史角度讨论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范式及其后续转向[5][6]。近年的文学理论教材同样仍将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作为理解现代批评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7][8]。这些研究提示我们，与其把结构主义视为一套需要完整复述的理论知识，更有意义的问题是：它在具体文本细读中究竟能够发现什么，又在哪些位置需要其他理论加以补充。

本文拟从系统分析与主观体验之间的张力出发，审视结构主义在诗歌批评中的作用。文章不试图对结构主义进行全面的理论史梳理，而是保留与诗歌细读直接相关的三个层次：首先以“关系构成意义生成基础”为总命题，说明索绪尔语言学对结构分析的启发；其次重点考察二元对立如何参与主题建构，

并以具体文本检验它何时能够成为有效的发现工具、何时又可能沦为预设标签；最后以似真性和互文性说明文本外部关系如何参与意义生成。贯穿这三个层次的共同标准，是任何理论判断都应返回词语选择、结构位置、和文本间关系等可核查证据。最后，本文再讨论作者和读者主体性，以说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价值及其适用边界。

2. 关系：意义生成的基础

结构主义的一项基本主张是：意义产生于相对关系之中。意象内涵随语境而变化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首先，不同文本语境会赋予同一意象不同的含义。以英语诗歌中的玫瑰为例，在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A Red, Red Rose)中，“玫瑰”象征爱情可爱而热烈的一面；在马洛的《热情的牧羊人致爱人》(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中，玫瑰则成为甜蜜婚姻的许诺；而在艾米莉·勃朗特的《爱与友谊》(Love and Friendship)中，“玫瑰”由正面符号转为负面符号，突出爱情的脆弱与短暂。其次，同一意象进入不同阅读文化时也可能产生不同联想。狄金森在《我居住在可能性中》(I Dwell in Possibility-)里把诗歌比作一所拥有更多窗户和更优越之门的房屋(第2~4行)。“门”与“窗”首先在诗内构成内/外、封闭/开放的空间关系，并与“可能性”的开放意味互相强化；不同文化的读者可以形成进一步联想，但这类外部解释应建立在诗内关系已经得到确认的基础上。再次，不同历史语境也会丰富意象的内涵。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自然意象在当时语境中常与工业化城市经验形成对照，而当代读者又可能从生态问题出发获得新的理解。这些变化共同说明，符号的意义并非固定地附着在意象本身，而是在文本、文化与历史关系中不断获得限定。

3. 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诗歌批评的理论来源

笛卡尔发明坐标系，以精确方法处理复杂的几何问题；索绪尔则开创结构主义语言学，从系统角度分析繁复的语言现象。能指与所指、聚合关系与组合关系、共时性与历时性，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概念。能指指符号的声音形象，所指则指符号所代表的概念([9]: p. 118)。形象地说，能指如同容器，所指则如同盛在其中的酒液；一个容器可以盛放不同的酒，一个符号也可以指涉不同的概念。聚合关系相当于“选择”，关注句子成分可能被哪些要素替换；组合关系近似于“结合”，强调语言序列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语言的共时性指某一特定时刻的语言状态，历时性则指语言随时间发生的演变。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何以语言学为方法论基础？尽管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存在差异，二者的核心都是对语言的使用。巴特对结构主义的界定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结构主义是“一种源自现代语言学方法、用于分析文化制品的方式”([1]: p. 4)。巴特将结构主义的分析对象限定为文化制品，他本人以结构主义方法研究时尚，列维-斯特劳斯也在结构主义指导下取得了人类学成就。文学无疑属于文化制品，因此，以语言学逻辑分析文学作品具有合理性。

下文将运用上述索绪尔语言学概念，对若干诗歌进行分析。

第一，能指与所指。翁贝托·埃科认为，“文化现象同时也是符号现象”([10]: p. 61)。既然符号由能指与所指构成，我们便可以通过解码文化符号来阐释诗歌。济慈为何选择古希腊瓮作为颂歌的中心意象？古希腊瓮作为人工保存的器物，与诗中关于时间、静止和艺术的讨论形成稳定联系，因此这一意象可以被理解为艺术形式抵抗瞬间消逝的象征。在狄金森的《越过篱笆》(Over the Fence-)中，“篱笆”首先建立内/外、可达/不可达的空间区分；“围裙”则把越界行为与日常行为规范联系起来。说话者想越过篱笆去采草莓，却又顾虑弄脏围裙可能带来的责备(第6~7行)，由此形成“欲望/约束”的关系。结构主义分析在这里能够确认的是两个日常意象共同限定了说话者行动的边界。

第二，聚合关系。聚合关系能够引导读者说明诗歌选择某一词语或意象的合理性。读者不断提出并

检验可能的替代项，便会逐渐认识到诗人选择所产生的具体效果。在布莱克的《天真的预示》(*Auguries of Innocence*)中，诗人从无数微小事物中选择“一粒沙”，使其与“一个世界”构成对照，展示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悖论。若沿聚合轴设想其他替代项，“沙”相比“石块”等更完整、封闭的物体，更突出颗粒性与可数性，因此既能表示一个极小单位，又容易使人联想到由无数单位构成的整体。“一粒沙/一个世界”的并置由此同时激活个体/整体、微观/宏观、有限/无限等关系。

第三，组合关系。诗歌是一种时间性艺术，读者需要在线性阅读过程中不断修正对作品的理解。组合关系分析因此不只是把“各部分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追踪前后位置如何改变同一对象的意义。伊丽莎白·毕肖普的《鱼》(*The Fish*)开篇写一条被钓起、停止挣扎的鱼，说话者在行动上处于明显优势；随后，鱼身上破损的皮肤、伤痕和内部结构不断强化它作为“被捕获之物”的脆弱状态。到了后半部分，残留的鱼线与旧鱼钩却证明它曾多次遭遇捕捉并存活下来，这些新信息反过来改变了读者对前文细节的评价：伤痕不再只意味着受害，也成为生存经历的记录。结尾处说话者将鱼放生，又使开头的“捕获/被捕获”关系转换为“释放/被释放”。因此，诗歌的主题并非由某一个意象直接给出，而是在组合轴上通过信息累积、价值反转和结尾行动逐步形成。

第四，共时性与历时性。卡勒指出：“抒情诗往往无须参照时间发展过程，便可作为一个整体被把握”([1]: p. 108)。抒情诗这种弱时间性特征，与语言学对共时性的强调相契合，因为共时性关注语言系统的静态状态。英语诗歌中时间标记的缺失和一般现在时的使用([11]: p. 288)，往往使线性时间难以建立。狄金森的《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即是典型例子。诗中的悖论消解了时间的可测量性：现实中死亡发生于瞬间，但诗中“死神”的彬彬有礼与从容不迫，却把这一瞬间延长(第 5、8 行)；“数百年”与“一天”的并置(第 21~22 行)，又使时间流逝变得不可感知；死神最终驶向永恒(第 24 行)，则把不可逆的线性时间转化为循环性的运动。

4. 二元对立：有效的分析工具

上述诗歌分析所运用的语言学概念有一个明显共同点，即它们都建立在二元关系之上。二元对立确实是结构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便把它视为分析文化现象的有效工具。弗莱提出的视觉性(*opsis*)与声响性(*melos*)同样构成一组用于分析文学结构的二元范畴。*Melos* 指文学的动态方面，例如诗歌节奏。惠特曼的《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大量使用位于诗节开头或结尾的反复句、“-ing”的元音回响以及头韵，这些节奏手段使诗歌更加朗朗上口、易于记忆，也增强了诗性魅力。*Opsis* 则关注文学的静态方面，如诗歌中的视觉呈现。叶芝在《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中精确描写丽达受惊恐惧的状态，包括她踉跄的身体和急促的心跳(第 2、8 行)；这种生动描写连同强烈的黑白色彩对比，揭示了神与人结合所包含的暴力与恐怖。丁尼生的《轻骑兵进攻》(*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则体现了 *melos* 与 *opsis* 的结合。炮弹的猛烈轰击和军队之间的激烈对抗构成鲜明的战争画面，既表现战争的压迫本质，也突出士兵的英勇；与此同时，每节结尾反复出现的“六百人纵马前进”，与诗中士兵人数的逐渐减少相互映照，象征士兵面对战争残酷时始终不变的坚毅。声响性与视觉性的结合，使整首诗成为一曲悲壮而肃穆的士兵赞歌。

二元对立不仅启发批评家建立有效的文学分析模式，也会“支配主题建构的过程”([1]: p. 109)，因为主题经常在鲜明对照中显现。例如，弗罗斯特的《修墙》(*Mending Wall*)表面上通过筑墙与拆墙、封闭与开放之间的对立呈现人际关系的两种倾向，但如果只把它概括为“亲密/隐私”，二元对立便容易退化为主题标签。诗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对立项之间的相互转换：墙把两户人家分开，却也使两位邻人每年因修墙而共同劳动；自然与猎人不断制造缺口，使墙无法成为绝对稳定的边界；说话者反复质疑墙的必要性，而邻人则重复“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两种话语形式本身也形成开放追问与格言式封

闭之间的对照。由此，墙同时承担“分隔”和“促成相遇”两种功能，诗歌真正呈现的不是静止的二选一，而是两端彼此规定的关系悖论。其主要二元关系及其转换见表 1。比利·柯林斯的《诗歌导论》(Introduction to Poetry)同样展示了人与诗歌之间两种截然相反的关系：前十一行中，人与诗歌如亲密的玩伴；后五行中，双方却变成施暴者与受害者。这两种关系分别代表由感知进入诗歌与强迫诗歌交出唯一意义的两种阅读方式。

Table 1. Binary relation matrix in “Mending Wall” based on textual relations
表 1. 《修墙》的二元关系矩阵(据文本关系归纳)

关系维度	一端	另一端	诗中的转换
空间	墙/边界	缺口/开放	墙不断被破坏，边界只能被临时维持
行动	修补	破坏/散落	破坏使修补成为年度共同活动
人际	分隔	接触/合作	墙既保持距离，又促使邻人相遇

二元对立不仅存在于单篇作品内部，也可以通过互文性阅读在不同文本之间被发现。最典型的例子是布莱克的《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与《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以两首《圣星期四》(Holy Thursday I 与 II)为例，第一首描写儿童在教堂聚集、参加节日仪式的场景，营造出明亮、绚丽而欢快的氛围；第二首则转向教堂外荒凉的田野和穷人的悲惨生活，重现一个缺乏光亮与色彩的严酷现实。空间、氛围和色彩的多重对立，使第一首中井然有序的仪式场景在第二首中受到重新评价，并把公共庆典与现实苦难之间的距离凸显出来。

5. 似真性：互文性的基础

在诗歌阐释中，互文性通过揭示某一具体诗歌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帮助读者解码其内涵。互文性的基础是似真性(*vraisemblance*) ([1]: p. 163)。所谓似真性，是指在恰当语境中找到合理解释，从而使表面上难以理解的作品获得意义。卡勒把似真性概括为五个层次：第一，“真实”，即社会现实；第二，文化似真性，即社会共享的文化知识；第三，体裁模式；第四，约定俗成的自然化方式，它能够暴露作品的虚构性；第五，戏仿与反讽([1]: pp. 164-187)。以下分析分别对应这五个层次。

第一，布莱克的《伦敦》(London)反映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都市经验。“特许的街道”与“特许的泰晤士河”中“charter’d”一词的重复，使原本开放、流动的城市空间被同一种“规定/限制”的语义覆盖。随后，“扫烟囱童工的哭喊”(第 9 行)、“士兵的叹息”(第 11 行)和“妓女的诅咒”(第 14 行)把不同身份、不同位置的声音并置起来，使个人痛苦扩展为贯穿城市空间的共同经验。这里，社会现实层面的似真性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这些职业与都市生活的历史背景。

第二，第文化似真性依赖读者共享的文化知识。叶芝的《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以希腊神话中宙斯化身天鹅接近丽达的故事为背景，诗中“天鹅”因而不是普通自然意象，而携带神祇身份、暴力事件及其后续历史的文化联想。诗歌结尾进一步把这一瞬间与特洛伊战争和阿伽门农之死联系起来，使一次身体冲突被置于更大的神话 - 历史因果链中。若缺少这一文化知识，读者仍能感受到“强/弱”“神/人”的形式对照，却难以理解为何诗歌把短暂的遭遇扩展为历史转折。由此可见，文化似真性的作用并不是替代文本细读，而是为文本中已经出现的符号关系提供可验证的文化背景。

第三，叶芝的《驶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符合抒情诗的体裁惯例。诗歌继承了抒情诗的经典主题：人类的艺术创造能够抵抗时间流逝。说话者的目的地拜占庭，是早已消逝的东罗马帝国都城。全诗贯穿一般现在时，即便描述希腊金匠已经完成的制作活动时也是如此(第 27~28 行)。金枝之歌让过

去、现在与未来并存，突破了日常时间规则，使诗中的时刻“在每一次阅读时重新发生”([11]: p. 295)，由此实现对时间的超越。

第四，玛丽安·穆尔的《诗》(*Poetry*)是一首元诗，因此它对诗歌创作的讨论具有充分理由。诗句排列不规则、断行零碎、破折号大量出现，都展示了诗歌形式的无限可能。诗中列举日常甚至略显粗俗的意象，如“教科书”(第20行)和“像马一样抽动皮肤的批评家”(第15行)，意在说明诗歌意象不应只限于精致高雅的对象。对诗歌材料的评论则暗示，诗歌创作必须在想象与现实之间保持平衡。“有用之物”变得无法理解，象征现代诗歌的一种实践(第7~9行)，说话者对此明确作出否定回应：“我们/并不赞赏/自己无法理解的事物”(第10~12行)。整首诗可以看作说话者对诗歌创作的反思与观察。

第五，沃尔特·雷利爵士的《仙女答牧羊人》(*The Nymph's Reply to the Shepherd*)构成对马洛《热情的牧羊人致爱人》的戏仿。马洛诗歌第一节以迷人景色和悠闲节奏编织出令人向往的田园生活，牧羊人还用玫瑰花床、裙衣和拖鞋等充满爱意的手工礼物，向爱人许诺理想婚姻。然而在雷利的诗中，仙女指出美终将衰败，并放大田园生活的消极面；她说明这些礼物都会被时间磨损，从而击碎婚姻许诺构成的美丽幻象。马洛的诗着力铺陈爱情的美好与甜蜜，雷利的诗则通过展示爱情在时间面前的脆弱，突出其短暂性。

6. 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主体性

结构主义的局限不宜被简单表述为“客观结构”与“主观体验”的二元对立。读者反应理论和现象学批评表明，文本结构与阅读主体之间更接近相互制约的关系。伊瑟尔在《阅读活动》中强调，文学文本通过空白、未定点和视角组织为读者提供实现意义的结构条件，而作品的审美效果又只有在阅读活动中才能具体化[12]。因此，读者不是被动接收一个已经完成的结构，也不是可以任意赋义的主体；文本为阅读设置方向，读者则在这些限制之内完成连接、补充和修正。这样理解主体性，可以避免把“结构”与“体验”视为彼此排斥的两端。

作者因素也需要从“唯一意义来源”与“完全无关”之间寻找更严格的位置。赫施强调解释的有效性需要讨论作者意图与文本证据之间的关系[13]，但在具体文学批评中，作者材料更适合作为限制解释范围的语境证据，而不应取代文本本身。以狄兰·托马斯的《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为例，诗人父亲病危的创作背景([14]: p. 1465)能够解释最后一节为何从概括不同类型的人转向直接呼告父亲，但真正使“反抗死亡”成为全诗结构核心的，仍是题句及其变体在各诗节中的反复。类似地，叶芝《当你老了》(*When You Are Old*)的传记背景可以丰富爱情主题的理解，却不能替代诗中“年轻/衰老”“外在美/内在灵魂”“留下/离去”等关系的文本证据。作者意图因此应当成为可与结构分析互相校准的材料，而非唯一裁决。

读者主体性同样不能被等同于“任何理解都成立”。费什提出“解释共同体”，正是为了说明阅读策略并非纯粹私人行为，而受到语言习惯、教育背景和批评规范的共同塑造[15]。不同读者可以对同一首诗作出不同解释，但这些解释仍可依据文本覆盖度、逻辑一致性和语境证据进行比较。就本文而言，结构主义最重要的价值正在于提供第一层可核查的约束：一项主题判断应能够说明它依赖哪些词语关系、结构位置或文本间对应；读者经验则在此基础上说明这些结构如何被感知、联结并转化为审美意义。因此，文学批评中的主体性不是结构主义的外部反面，而是文本结构在阅读中获得实现的一个环节。

7. 结论

本文从“意义产生于相对关系”这一结构主义核心命题出发，把结构主义理论与诗歌分析结合起来，考察其在文学批评中的价值与局限。结构主义强调文学背后的系统，认为各种关系网络能够丰富文学阐

释。索绪尔的语言学体系为结构主义提供了重要启发，其中的二元对立仍是结构主义及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有效工具。本文对《鱼》《修墙》等文本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二元对立真正具有方法论价值的地方，并不是把作品归纳为若干现成的“两极”，而是检验对立项如何在词语选择、结构推进和反复转换中形成。与此同时，结构分析只能首先证明文本关系本身，不能自动推出特定的社会历史判断，也不能单独说明作者材料与阅读体验的全部功能。

因此，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价值应体现为一种有边界的分析程序：它帮助读者从可核查的关系证据出发建立解释，同时允许其他理论在不同层面补充和修正这一解释。作者背景可以提供语境限制，读者反应理论可以说明文本结构如何在阅读中被实现，互文与历史材料则能够扩展作品的关系网络。所谓在“系统分析”与“主观体验”之间保持平衡，并不是把二者作为互不相容的两端折中处理，而是区分不同证据各自能够回答的问题，使文本结构、作者语境与读者经验形成相互制约的阐释层次。由此，结构主义既不会被当作唯一答案，也不会失去其在诗歌细读中组织证据、控制阐释跨度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Culler, J. (2002) *Structuralist Poetics*. Routledge.
- [2]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第3版.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3] 赵毅衡.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M]. 修订版.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4] 赵一凡, 张中载, 李德恩. 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一卷)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
- [5] 周启超. 结构主义文论回望与再探[J]. 文艺理论研究, 2018, 38(5): 26-33.
- [6] 张庆熊. 语言与结构主义方法论: 从索绪尔出发的考察[J]. 社会科学, 2020(5): 111-122.
- [7] Barry, P. (2017) *Beginning Theory*. 4th Edi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8] Tyson, L. (2023) *Critical Theory Today*. 4th Edition,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003148616>
- [9] Lentricchia, F. (1980) *After the New Critic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229058.001.0001>
- [10] Eco, U. (1973) Social Life as a Sign System. In: Robey, D., Ed., *Structuralism: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7-72.
- [11] Culler, J. (2015) *Theory of the Lyr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2] Iser, W. (1978) *The Act of Reading*.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3] Hirsch, E.D. (1967)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4] Ferguson, M.W. (1996)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 4th Edition, W.W. Norton & Co Inc.
- [15] Fish, S. (1980)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